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民國時期的軍事與軍事化」研討會綜述

李志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民國初年的中國，充斥著各種形式的戰爭。可以說，這段時期的民國史是由戰爭塑造的歷史。軍事是這段歷史的核心問題，軍事化則是貫穿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治、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向，這一趨向在 1949 年到文革期間達到了高峰。軍事和軍事化問題，一直是民國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201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中心，共同策劃了兩次學術會議，分別探討民國時期的法律和軍事。首次會議於 2012 年 9 月 21 - 22 日在伯克利召開，主題為「民國的法律、政治與社會」。2013 年 9 月 27 - 28 日，第二次會議——「民國時期的軍事與軍事化」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拉開帷幕。

此次會議邀請了中、美、英、德等多國的中青年學者參加。與會的九篇專題論文，囊括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各個時段的軍事問題，涵蓋了攝影、音樂、佛教、盜匪，兒童等多方面內容，涉及地方軍事化、軍隊與地方關係、軍隊政治工作、國共兩黨的軍事工業、戰時社會動員、戰爭中的地方精英與「通敵者」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此外，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汪朝光教授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歷史系段瑞聰教授，還分別就近年來中國的抗日戰爭研究和日本的抗日戰爭研究做了專題報告，全面扼要的介紹了近年來中日兩國有關抗日戰爭的研究成果，並分析了各自的特點和局限。在最後一

編按：本文所稱「民國時期」係指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

場開放討論環節中，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的主題發言，深入反思了總體戰、全民動員和 20 世紀中國暴力文化的問題，引起與會學者的熱烈回應。本文根據討論主題，將與會報告分為「總體戰與社會動員」、「地方精英與基層統治」、「軍事工業與軍隊建設」、「研究綜述」等四個部分，做一簡要評述。

一、總體戰與社會動員

1930 年代德國的軍事理論家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一書中指出，現代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戰場將擴大到參戰國的全部領土，捲入戰爭的不僅是軍隊，而是一國的全體國民，它需要動員整個民族的總體力量，涉及到每個人的精神生活，必須利用一切手段進行全民動員。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就是這樣一場總體戰。近年來，有關戰爭動員的研究日益受到學者關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段瑞聰教授的論文《蔣介石與抗戰初期總動員體制之構建》，體現了這一類研究的成果。文章通過考察抗戰初期蔣介石的總動員理念和國民政府有關總動員實施機關的變遷及法制工作進展，探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構建總動員體制的過程及其存在的問題。作者認為，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形成以國防建設為重點的總動員理念，1935 年開始著手實施，但是，負責國家總動員的機關卻模糊不清。1937 年國民政府成立國

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制定《總動員法》和《總動員計畫大綱》，學術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也是空白。作者通過嚴密的制度史梳理，還原了總動員機關的變遷過程和相關法規的制定經過，指出：國民政府中存在「軍高法低」的現象，其未能有效建立自上而下的動員體制，既表現出國民政府動員體制的缺陷，也反映了蔣介石領導戰爭能力的局限。

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宗小娜（Shana J. Brown）教授的論文：〈軍事的鏡子：民國和戰時的軍事領袖人像攝影〉（*The Mirror of the Military: Photographic Portrayals of Military Leadership in the Republican and Wartime Periods*），研究了攝影手段及技術在政治動員中的應用。文章梳理了 20 世紀中國人像攝影「政治化」的歷史，指出，從民國第一任總統孫中山的人像攝影開始，政治人物肖像就蘊含著豐富的象徵意義，黨派領袖通過攝影來創造政治認同，軍事領袖及其軍隊的照片在意識形態宣傳中被廣泛應用。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攝影理念和攝影風格的革新，又通過吳印咸等左翼攝影家的探索，攝影最終從藝術走向政治，成為表達政治理念、表現領袖人物精神、宣傳意識形態、組織發動群眾的利器。這些都在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像攝影中得到集中體現。作者分析了吳印咸的《創業》、《組織起來》、《揮手之間》等延安時期著名毛澤東肖像的攝製過程，揭示了攝影技術如何表現

出毛澤東的「偉大精神」，以及戰爭時期如何通過攝影來創造偉大領袖形象的機制。

密西西比大學歷史系何稼書（Joshua Howard）教授的論文〈國防音樂：抗戰時期的軍事音樂創作〉（‘Music for National Defense’: Making martial musi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研究音樂如何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來進行戰爭動員。1936年以後，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劇，中國一些左翼音樂家提出了「國防音樂」的口號，即音樂創作要為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要致力於喚起民眾的反抗精神，組織民眾，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在國防音樂的旗幟下，開拓出全新的音樂形式，創造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歌曲，還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左翼音樂家深入到軍隊、學校和各種民眾團體中，向士兵和民眾教唱抗日歌曲，組織歌詠會、合唱團，用歌唱集會來動員民眾，傳播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作者著重研究了聶耳的生平和創作、社會活動家劉良模在推廣民眾歌詠運動中的貢獻、賀綠汀的《遊擊隊歌》與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的創作和流傳，以及兩位共產黨音樂家鄭律成、何士德的生平及其各自代表作《八路軍軍歌》、《新四軍軍歌》的創作過程。作者高度肯定了國防音樂創作和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對於鼓舞軍隊士氣、喚起反抗精神、形成國家意識、最終對於抗戰勝利所起的作用。並指出，雖然國軍士兵也喜歡唱這些愛國歌曲，但是國民黨厲行防共

反共，其內部又缺乏以藝術手段進行政治宣傳的組織結構，歌曲中所包含的反抗精神和社會批判內容，以及大眾參與的形式，也使其心存畏懼。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中既缺少傑出的作曲家，也沒有優秀的軍隊進行曲和大規模的歌詠運動。在國共內戰中，八路軍竟然聽到國軍士兵在唱著他們的《八路軍軍歌》。與之相比，延安則是一片歌聲的山谷和海洋。這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反思中共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

密西西比大學歷史系田梅（Margaret Tillman）的論文〈太平洋戰場總體戰下的軍事化童年〉（*Militarized Childhood in the Pacific Theater's Total War*）研究了總體戰中兒童的命運。在二戰中，軍事化對社會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在美國本土這塊和平的土地上，小學生們也在玩打倒希特勒的遊戲。在總體戰的背景下，孩子應該擁有受保護的童年，還是經歷嚴格的軍事訓練？1930年代的中國也經歷著這樣的困境。在日本戰爭威脅和社會整體軍事化的趨勢下，中國在抗戰中經歷了真正的總體戰。9,500萬難民和無數喪失家庭庇佑的孩子，既需要政府和國際力量的保護，又極易成為軍事化的對象。作者用「軍事化童年」的概念，揭示了這一困境。雖然在戰前，兒童玩具的生產和兒童遊戲已反映出軍事化趨向，但扮演士兵畢竟不同於為了國家利益而被徵召入伍。在總體戰下，兒童也被要求承擔戰爭責任。少年的英雄主義和受難往往更令人心酸，因為他們

是無辜的孩子。國家和國際社會對於照料兒童負有責任，但這又常常使他們變成黨國的政治工具和外交手段，以兒童福利為名，向社會籌募資金，以及爭取盟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此外，家庭軍事化和對於婦女的動員，也直接影響了孩子們的童年。作者特別研究了中共延安時期的婦女動員和軍事化。在崇尚婦女解放和強調組織性紀律性的延安，領導幹部貶低家庭照顧兒童的意義，代之以專業化、科學化的幼稚園制度，管理嚴格，注重衛生，注重體育鍛煉，注重培養孩子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勞動習慣，在這背後，是童年的軍事化。作者關心的問題是，在一個軍事化不斷升級的世紀裡，有和平、私人、家庭和童年的空間嗎？

二、地方精英與基層統治

民國時期的廣東珠三角地區，是國民黨政權的大本營和北伐戰爭的策源地。這裡民風強悍，社會動盪，盜匪林立，民間武器氾濫，是觀察晚清以來中國地方軍事化、武力化和基層政權結構的典型地區。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何文平教授的論文〈民國初年珠三角地區的匪患與軍地矛盾——以九江事件（1923-1925）為例〉，通過研究1923-1925年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鎮發生的軍隊與民團衝突，深入分析了民國早期廣東地方軍隊的複雜構成及軍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作者指出，民國早期的廣東，是一個各種政治

勢力相互鬥爭的大戰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此三次建立政權，政局變化導致本地原有的軍隊不斷分化組合，滇、桂、湘、贛等客籍軍隊又相繼進入，加之各類民軍、地方武裝分起擾攘，使廣東的軍隊構成十分複雜，同時匪患又是影響軍隊與地方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社會秩序混亂、匪患嚴重，政府需要調集軍隊下鄉圍捕盜匪，維護治安，這就成為軍隊進入地方社會的一種重要方式。然而，由於盜匪問題的複雜性和軍隊本身構成的複雜性，軍隊清鄉剿匪在很多情況下反而更加激化了鄉村社會原有的矛盾。軍隊來到地方之後，不但違法違紀，頻繁擾民，更常常以剿匪為由，割據防地，以收取捐稅及獲取各種社會資源。民國初年滇、桂等客籍軍隊進入廣東，社會基礎更為薄弱，缺乏認同感加上利益之爭，使軍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緊張、衝突不斷。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依賴軍閥軍隊而難以在廣東建立穩固政權的原因之一。

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系江建明教授（Brooks Jessup）的論文〈走下地獄的菩薩：戰時上海的佛教通敵者聞蘭亭〉（A Bodhisattva Descends to Hell: The Buddhist Collaboration of Wen Lanting in Wartime Shanghai）以日本佔領下上海的佛教徒和通敵官員——聞蘭亭為中心，研究抗戰時期上海的佛教活動及當地精英與日本人的合作。二戰期間，日本佛教界全體效忠天皇，並將

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作為自己的使命，在占領區廣植寺廟，推廣佛教。他們的工作得到了中國部分佛教人士的配合。這些中日合作的佛教組織的日常活動包括聯合舉行儀式，聯合佈道，實施某些社會福利等。長期以來，我們對於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往往簡單貼以「漢奸」標籤而缺乏深入研究。但作者注意到，無論是汪精衛、褚民誼還是聞蘭亭，在決心與日本人合作時，都援引了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這共同自我犧牲的隱喻，反映了通敵者們的複雜心情，提示我們重新認識這些人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聞蘭亭是上海著名商界領袖，以襄助政府、熱心公益、扶危救困而聞名海上，篤信佛學。1943年受日人迫脅出任偽商統會監事長等職，並參與了一系列佛事活動。作者以安撫亡靈的「慰靈法會」為例，指出，儘管戰時佛教是日本建立大東亞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仍使地方精英可以公開處理戰爭對人們精神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慰靈法會等佛教儀式不僅針對戰死的亡靈，也安撫各種死於非命的孤魂野鬼。加之對於窮人和災民的救濟，使身處地獄般戰爭、暴力和貧困狀態中的人們，獲得了強烈的共鳴。文章揭示了在敵占區所謂漢奸政權下，通敵者的處境及其為保護地方社會所做的各種努力，為我們突破極端民族主義，重新看待汪政權和戰爭中的通敵者開闢了新的視角。

莎拉勞倫斯學院 (Sarah Lawrence College) 亞洲部藍凱文 (Kevin Landdeck) 教

授的論文〈雞腳神？還是保護人？：四川鄉村的徵兵、村落和社會衝突 (1937-1945)〉

(*Chicken-footed Gods or Village Protectors?: Conscripted,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Rural Sichuan, 1937-1945*)，將目光下移到國民黨縣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保甲，通過對環繞重慶的四川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區下屬十個村莊的深入研究，展現了戰時國家動員與地方社會的複雜互動關係。國民政府的戰時兵役制度，因腐敗盛行和各種強制拉夫，長期以來為人詬病。保甲長直接負責徵兵和鄉村事務，更是惡名遠播。人們普遍認為，正直和有教養的人不願充當保甲首領，保甲長都是土豪劣紳，是雞腳神和敗壞徵兵制度的罪魁禍首。作者認為這種觀點錯誤理解了四川鄉村社會，低估了戰前中央試圖進入地方所引發的行政改革對基層行政帶來的影響。事實上，保甲長與鄉村社會的關係遠為複雜。有時他們是共同體內部的掠食者，利用徵兵的機曾敲詐勒索，貪污中飽。但也有時村民向更高當局請願，控訴地方行政黑暗和保甲長的罪惡，是一種自我保護或謀求利益的策略，甚至是誣告。通過官方管道向更高權威表達訴求，將外部權力引入村莊，告發者既回避了與基層權力的直接對抗，又強化了國家權威。有時候保甲長是共同體外部的掠奪者，為了完成國家分派的徵兵份額，他們抓捕在本村短期居住或外來務工的人，甚至跨越村莊邊界去拉夫，由此引發公開的村莊械鬥。有時他們也切實扮演著

保護人的角色。保甲長畢竟要在自己的共同體中生活，對鄉鄰有著一定程度的責任感，能起到下情上達的作用，並且千方百計的減少本村的徵兵份額。作者揭示了保甲長階層既要完成國家的徵兵任務、又要面對共同體生存壓力的兩難處境，指出：第一，1930年代中期的國家建設和行政改革，直接影響了戰時地方基層行政，使民國時期的保甲制度與王朝時期有了根本性的區別。第二，四川的鄉村基層組織不同於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所描述的圖景。深植於本地社會的特點，讓他們無法以單純的「營利性經紀人」面目出現，或者完全作為國家的代理人，他們同時充當掠奪者和保護者的角色，既是「雞腳神」，又是「保護人」。這豐富了我們對於民國基層政權和戰時國家與地方社會關係的認識。

三、軍事工業與軍隊建設

湖南社會科學院王安中教授的論文〈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共軍工的制勝之道（1945-1949）〉，從軍事工業的角度分析了國共內戰中共最終勝出的原因。作者指出，內戰之初，共產黨在軍事工業領域與國民黨存在著巨大差距。但是，中共理性地分析了在雙方的差距，對解放區資源進行了合理評估，沒有依靠大規模修建兵工廠來與國民黨競爭，而是根據自身特點，有選擇性的放棄了技術複雜、投入巨大的槍炮等武器的

生產，將主要精力放在殺傷威力大、技術要求低、產能擴張快、運動能力強的炸藥、手榴彈、炮彈上，為前線戰場提供了充足的火力。為了集中資源於軍工行業，中共還發動了當時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全力保障軍工生產，自力更生發展軍事工業，從而大獲成功。而國民黨軍卻將主要武器彈藥來源寄託在對外採購上，沒有在軍工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投入，最終在兩軍前線火力較量中歸於失敗。從國共兩黨在軍事工業領域的較量可以看出，中共能夠迅速戰勝國民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注重策略性發展軍事工業，在作戰中發揮自身的火力優勢，實現了武器裝備與戰略戰術的完美結合，是克敵制勝的重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的論文〈北伐前後國民黨的軍隊政治工作〉，著眼於一個現代國家的軍權統一和軍隊建設問題。國民黨雖然在1928年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卻不能以黨的組織和意識形態統一全國軍隊，民國以來的地方軍事割據和武力「軍閥化」趨勢有增無減。作者從北伐前後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特點、汪精衛、蔣介石等黨國領導人對軍隊政治工作的反思等方面，重新探討北伐前後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得失。指出軍隊政治工作承擔著教育官兵、灌輸黨國意識形態、塑造認同與忠誠的功能，要將全國武力統一國民黨政權之下，建立「黨」對「軍」的穩固領導，就必須建成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體系。北伐期間，國

民黨的軍隊政治工作主要掌握在左派和共產黨人手中，清黨之後，左派領袖汪精衛在既無可靠軍隊掌控、又無國際勢力扶持的困境下，被迫放棄了原先那種由下到上、利用黨代表和政治部約束軍人、教育士兵的軍隊政治工作模式，轉而訴諸于建立集體領導的軍事委員會，以黨紀約束軍人。蔣介石則將政工組織明確限定為軍事機構的附庸、是軍隊中推行精神教育、灌輸三民主義和反共意識形態的機構，其功能僅限於監督、教育官兵，黨代表制度完全廢除。派系鬥爭、黨不能統一，是造成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幾經波折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

四、學術綜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教授的報告〈近年來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分析了近年來中國抗戰史研究的特點、成果和不足。認為，抗戰史論題廣泛，論著眾多，史料開放程度高，對史料的整理出版也有相當進展，這些都是研究的有力推動因素。近年來，抗戰史研究有了大幅進展，在有關抗戰時期正面戰場、國民黨與敵後戰場、抗戰與中國國家地位的改變、戰時後方基層社會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特別是國際合作研究的開展，如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中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和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都有助於抗戰史研究向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的問題推進。但是，抗戰史研究

又具有一些明顯的特點：如紀念性，抗戰研究與對戰爭的回憶和紀念密切相關，每逢重大紀念日，必為相應研究的出產高峰；如現實性，抗戰研究與現實形勢，尤其與中日關係發展密切相關，受政治局勢變動的影響較大，近年來有關揭露日軍侵華暴行、批判日本右翼史觀的研究便與現實政治直接相關；還有政治性，抗戰期間因為國共兩黨矛盾的存在以及國共內戰的影響，使抗戰研究中存在著國共兩黨話語權的爭奪，例如有關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關係等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國共話語爭奪，而成為了持續不斷的論題。最後，抗戰研究還受到網路因素和通俗寫作的影響，因為牽扯了國人太多的情感記憶，嚴肅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易推廣普及。也許正是這些特點，局限了中國的抗戰史研究，使得具有整體性視野、高水準、客觀性的學術研究產生不易，並缺乏國際視野，未能把抗戰放置在更廣闊的國際關係脈絡和世界格局中來理解，對日本國內政治軍事與中日戰爭的關係也缺乏研究，有關汪政權和淪陷區社會狀況及民眾日常生活的研究十分薄弱，並較少參考國外的史料與研究成果。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段瑞聰教授的報告〈日本有關中日戰爭研究之主要動向及其成果（2007-2012）〉，梳理了近五年來日本有關中日戰爭的史料結集和論著出版。認為近年來中日戰爭研究的成果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共同研究成果顯著。從2000年

至今，美國哈佛大學、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組成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出版了 4 部論文集，從中國地方政權、軍事、社會文化、國際關係等多角度全面研究了中日戰爭。日本學者還就戰時中日兩國基層社會進行了共同研究。第二，研究主題豐富，涉及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如戰時中共的財政政策、國共兩黨的動員體制、華僑與抗戰的關係、日本陸軍內部「中國通」的思想與行動分析、日本與英美之間在中國展開金融爭霸戰的背景和過程，在華日本企業的經營活動等等。第三，有關滿洲事變和偽滿洲國的研究範圍極廣，成果豐富，涉及滿洲的歷史、社會、文化、宗教、文學等各個領域。第四，關於華北事變和盧溝橋事變，沒有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出現。「盧溝橋事變」仍被稱為「事件」，日本學者認為它是一起偶然事件，並非有計畫全面侵華的開端。第五，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學者稱為「南京事件」），始終存在承認與否認兩派，有些研究已超出學術範疇而成為一種政治活動。第六，有關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三人身上。第七，對於戰爭責任、戰後處理、戰爭的歷史認識等問題，至今仍影響著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最後，段教授指出，迄今為止，日本的中國研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保持著較高的水準。但是，中日戰爭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一些政治家關於歷史問題的一句

「失言」，往往抵消了學者們多年辛勞所產生的作用。隨著戰後第一代中國學家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和中日關係的惡化，中日戰爭研究無疑將受到影響，如何客觀理智的進行中日戰爭和中日關係史研究，是學者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20 世紀前半期的中國，經歷了空前嚴酷的戰爭、軍事化和國家社會的重組。如果把中國看成一個場域，我們怎麼理解在這個場域中發生的各種變化的動力和方向？是誰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以往的民國史研究往往比較重視中國境內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在此次會議中，方德萬、葉文心、汪朝光等多位學者，都強調了國際視野的必要性，指出中國的變化不能完全歸因於境內有組織的力量，它與境外各種力量息息相關。此外，在 20 世紀中國，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受害和犧牲，它與革命和建國緊密相連。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全體國民經受了身體動員和精神洗禮，共產黨強化了自身的組織，誕生了一批有創造力的軍事領袖，發展出各種突破性的戰略、戰術。方德萬教授因此提出，離開「受害者」和「總體戰」兩種敘事，重新理解戰爭和軍事化對於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和人民生活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將戰爭本身作為一種歷史敘事，作為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之外，觀察和書寫中國現代史的另一種視角，看看能發現什麼。例如，在二戰中，中國是一個落後的戰場，它在工業、科技、社

會組織上都很薄弱。當一個落後的社會經濟體與發達的社會經濟體相遇時，強化黨的組織和力量，就有客觀上、軍事上的必要性。那麼，諸如延安整風這樣殘酷的整黨過程，是否就有現實上的合理性？又如，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戰爭中立足，在與各種比它強大的社會經濟體的對抗中建立了國家，由此形成的對於「落後就要挨打」的根深蒂固的焦慮，乃至歌頌戰鬥、血的洗禮和浴火重生的「暴力文化」，這種一意追求「富強」、「發展」的意識形態和歌頌鬥爭的文化，是否已經終止？是否應該反思？它對未來中國的文化和政治想像又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引發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歸根到底，我們討論戰爭是為了在我們的可以預見將來，不再有戰爭。希望有一天在一種更高的政治理想下，我們能把所有的戰爭都當作一個故事，一個神話來講述，從戰場真正回到故鄉。

出版資訊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 略稿本（1）～（82） 民國 16 年 1 月至 38 年 12 月

全套出版完畢

內含蔣中正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函電、命令、文告與日記文稿的摘抄，完整記錄蔣氏在中國大陸的崛起、北伐、剿匪、抗日、國共內戰及其帶領中國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完整歷程。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296）